

我所敬仰的王世杰先生

王健民

今年三月是王世杰（雪艇）先生的九十華誕，雪老德崇望重，士民景仰。算來他長於我不過十三歲，但我總覺得大我一輩。其原因是雪老入世頗早，而我這個鄉下人入世甚遲。雪老到武昌讀書時是十二歲，而我是十九歲；雪公於民九任北大教授時，我還在鄉間唸私塾；當我於民十八唸上海大夏大學二年級時，雪公已創辦武漢大學且身任校長，而他的「比較憲法」正是我的課本。這一「代溝」實在不小。

抗戰時期，我們都在重慶，使我有追隨並私淑雪老機會。民卅，雪老任宣傳部長，我因副部長潘公展先生及中央周刊社社長陶百川的推薦，雪老派我任「三民主義研究委員會」委員，旋調至軍委會參謀總長辦公室任秘書，擔任戰時聯繫工作」。展公是上海市社會局我的長官，百公於我介於師友之間。我在宣傳部的工作直接由雪公及展公指導，但除職務上關係外，我與雪公並無多接觸。我這個鄉下人為人作事總是直來直往的，自己朝臉上抹粉，叫做「直道而行」，實際是不顧前後左右，彷彿目中無人，因此，一生中常常碰釘子，栽筋斗。在宣傳部也發生這麼一段插曲。一天，我去看一位高級同志，也可以說是我的頂頭上司，談的甚麼問題，現在已記不清楚了，

話不投機，那位上司赫然大怒，大聲斥責我；我這個鄉下人也大發牛脾氣，和他頂上了。那是一間個人小辦公室。爭吵之聲直達辦公室。我退出之後，先告訴百公，百公直搖頭；再報告展公，展公叫我辭職。我當場把辭呈寫好，呈送展公，他叫我親呈部長。我拿着辭呈晉見雪公，他起立迎接。我簡單報告經過，遞上辭呈，雪公連說「沒有事，沒有事，」看也不看就把辭呈退還，講了幾句題外的話，就示意我退了出來。漫天煙雲就這樣被一陣清風吹得無影無踪。

戰時宣傳部長工作

雪老担任宣傳部長期間（民二八至三一、三三至三四）正是抗戰期間，也是接受中共投誠期間，後者帶給雪老的麻煩不比日本軍閥小。其所以然者，中共信誓旦旦，願在政府及軍委會領導之下努力抗戰，而抗戰軍興之後，擁兵坐大，除民二六襲敵側翼之所謂「平型關大捷」及民二九敵後遊擊之所謂「百團大戰」外，畏敵如虎，一味避戰，而在另一面則為擴張勢力，常常配合敵人攻勢，襲擊國軍。於是所謂「磨擦事件」不斷發生。在此種情勢下，中共在宣傳上散播國軍不利消息尤令人髮指。記得民三三、五月，日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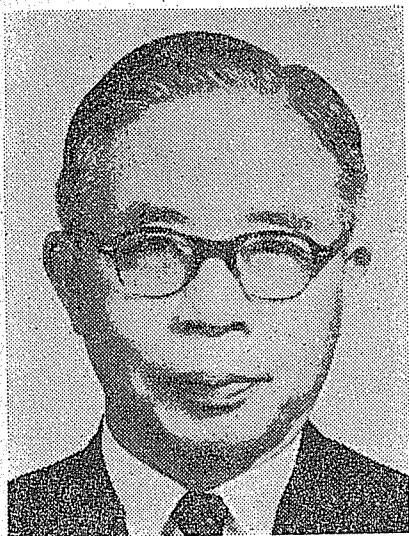
深入貴州，陷獨山，企圖威脅重慶。社會上忽傳出謠言，謂政府準備放棄重慶，西遷西昌。一日深夜，一留俄友人來訪見告，我對他怒吼：「不要聽共產黨造謠！」過了三天，國軍增援，打敗日軍，收復獨山，各報顯著登出，人心大快。而共黨的「新華日報」，在獨山失守時，誇張國軍不利形勢，但在獨山克復時，竟拒不刊載！雪老為抗戰大局着想，召見新華日報負責人潘漢年，曉諭他：共黨這種態度將有害於團結抗戰，亦會引起讀者對共黨反感。中共份子無論怎樣自外生成，究不能拒抗雪老之誠懇感召，而於翌日將收復獨山消息刊出。

抗戰後期中共的歪曲宣傳層出不窮，如所盤據「陝甘寧邊區」如何民主，中共在「邊區」並不實行共產，而是土地改革者……使好奇而不知情的人，尤其是外國記者，必欲一親親為快。這時正是國共又一次和談，史迪威和其左右從中攪和之際，中央覺得讓記者們去延安等地看看，使其不盲目作中共應聲蟲，亦無不可。於是他們於五月間組織「中外記者西北訪問團」前往。此一工作當然由雪老主持。在某一會議場合，關於團長人選問題，我記得雪公提到葉公超先生最為相宜，但其時葉在倫敦工作，戰時交通困難，勢

難趕回，乃以一位鄧先生担任。該團訪問了延安兩個月回來，中國記者認識共黨較清，報導尙稱客觀；外國記者則本其好奇的新聞觀點，一知半解之認識，再加上一些左傾的偏見，幾乎絕大部份接受中共宣傳，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，而是土地改革者，是民主主義者，也是堅決抗戰者，把中共捧上天。接着，九月，又發生了不愉快的史迪威事件，於是外國記者與美國在華一些文武官吏互相結合，指國民黨及政府爲貪污無能，一無是處。中、俄、美共更互相呼應，顛倒黑白，造成民三三以後世界輿論對中國最不利的情勢。對此，雪老無時不根據事實，指陳真相，以糾正其謬誤。而另一艱難的工作——國共和談，也落在雪老肩上。

艱難的國共和談

國共和談，國民黨方面是具有誠意的，有這



任總統府秘書長時的王世杰先生。

樣兩個故事可以證明，據雪老在台灣告訴我，抗戰末期，爲中共背信問題，國民政府蔣主席曾召開一次黨、政、軍高層會議，指示艱苦抗戰八年，勢將贏得勝利，我們不能再有戰事，中共問題必須用政治方法解決。二、大概在勝利之前，國共和談之際，雪老在宣傳部印發一文件，謂一旦抗戰勝利，我們必須和平統一，不能讓子孫再爲內戰而流血。我當時心中還頗持異見，以爲中共那些匪軍不堪一擊，不致把流血留給子孫。

雪老主持和談起於民國三十三年五月。此次和談是毛澤東所發動，經政府同意舉行的。毛派林祖涵到西安，雪老與張治中奉命前往晤談。林所提和平要求條件如下：

一、第十八集團軍及「新四軍」（共軍所改編），照去年林彪所提，編爲四軍十二師（原僅爲三個師及等於一個師的軍）。

二、陝甘寧邊區改爲陝北行政區，直隸行政院。

三、子中共以合法地位。

雪老等約林到重慶，六月，答復林，除核編共軍爲十個師外，餘均接受其要求。詎文件交林時，林提出另一文件，要求給共軍五個軍十六個師，承認陝甘寧邊區及東北中共一些根據地爲合法政府……林祖涵如此翻雲覆雨，以後雖有洽談，自然沒有結果。

九月十五日國民參政會開會，張治中與林祖涵均出席報告。雪老其時任參政會主席，我往旁聽。雪公給我「貴賓席」綵條。除雙方各報告和談經過外，林祖涵最後突然提出建立「聯合政

府」的要求，於是和談完全變質。

其時，美國派赫爾利將軍來華，表示願調處國共關係，獲得主席蔣公歡迎。十一月，赫氏飛延安訪毛，遽然接受毛的聯合政府要求，商定一草案而歸。於是以往要將共黨軍、政納入軌道之多次商談均置之腦後，而中山先生所定之施行憲政，還政於民之建國路線亦被打亂。

政府仍委屈求全，接受此一要求，同時提示：允共軍將領參加軍委會，改編其軍隊爲國軍，服從命令，命周恩來攜赴延安。但遲至歲尾，周又提出新要求，爲取銷邊區封鎖，釋放政治犯……談談歇歇，直至民三四年八月日本投降。

在此期間，雪老出任外交部長，簽訂中蘇盟約，担任更艱巨之任務。歸後，適毛奉 蔣公電召，來渝談和，雪公仍負和談之責。歷時月餘而簽訂「雙十會談紀要」。此後有美國馬歇爾及司徒雷登之調處，及各黨各派、無黨無派人士之奔走，歷時三年，終歸失敗。此中曲折複雜，非本文所能闡述。茲僅指出其癥結所在：（一）美國以美援爲武器調處和談，成則援至，不成則無；（二）政府爲戰後國家重建，需要和平，亦需要美援，故忍讓謀和；（三）毛共爲奪取政權，要破壞和平，亦要破壞美援，故百般刁難，至和談失敗而後已。從此可知，要和共黨談和，必須有力量能控制他，使其非就範不可，否則，必然徒勞而無功。

打落牙齒和血吞的對俄

外交

雪老從事外交工作時，我已去美國，三年後

歸國，因與職務上不相聯系，多年不曾謀面。大陸淪陷後年餘，我始脫離上海，民國四〇年到達台灣，再謁雪老於總統府。所以雪老外交上的貢獻，我所知道不多，記憶所及有下列數事。

民三二年雪老以訪英團團長偕王雲五、胡政之兩先生訪英首相邱吉爾於唐寧街十號。邱氏第一句話說：「這兒是做錯事最多的地方」名相名言，發人深省。

雪老一任外長，就奉命簽訂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」，如果沒有一種跳火坑、入地獄的精神，是不能擔任的。我們都知道：中蘇條約是根據雅爾他協定，我們不能抗拒雅爾他協定，就不能不訂中蘇盟約；而雅爾他協定是要我們放手外蒙，中東路共營和旅順、大連與俄共管的。我們抱着「毒蛇螫手、壯士斷腕」的精神簽訂此約，希望



民國三十年在重慶任中央週刊社社長時的陶百川先生。

達成兩個目的：第一、俄國侵略到此止步；第二、你不得幫助中共搗亂。白紙黑字，並不含糊。雪老曾告訴我，此約簽字後，蔣公正連電毛，要他來渝談和，毛尚躊躇觀望。歸國前，雪老面告史達林：中蘇條約目的在求中國的統一，只有毛應蔣主席約，雙方和談，統一才有希望。又提醒史：此約尚有待於我最高國防會議的批准，倘中國統一無望，則批准亦將有問題。迨雪老歸國，而毛亦到渝，相信毛必已受到史的指示。

不幸，中蘇條約中國所付巨大代價犧牲仍不能填史達林無厭的慾壑，他還進一步要求在我東北日人所遺龐大的工礦企業與我共營。他向我們的東北經濟大員張嘉璈提出此種要求，為此雪老告訴我。蔣主席曾召集中央高級幹部會議，雪老沈痛表示：我們對俄讓步已達最後限度，不能再有讓步，否則將永無止境。會議決定拒絕了史的要求。史乃一再要求與主席會晤，均遭婉謝，於是耍賴，違約延長撤兵時間達半年之久；將東北工礦機器拆卸竊走，搬不動者予以炸毀；將共軍引入東北，把日本關東軍武器供其裝備，以對抗國軍。這種反常的無視條約義務的行爲，已脫離了外交所能控制的範圍。

俄人此種風竊狗偷行爲，雪公於大陸淪陷之後，痛心疾首之餘，曾多次爲文加以揭露。其後中俄共交惡，俄人不打自招，把裝備在東北林彪部隊情形和盤托出，痛罵中共忘恩負義。雪公再爲文加以引用並斥責。該文所引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俄國華語廣播供給林彪武器，計：步槍七十萬枝，輕重機槍一萬四千挺，大砲一千八百門，迫擊

砲二千五百門，坦克七百餘輛，飛機九百架，及大型軍火庫四百所。俄人豈僅欲製造一「新滿洲國」，其目的非把國民政府顛覆不止。

在捲入中國國共關係漩渦中，雪老對馬歇爾和魏德邁有所批評。他告訴我，馬是一位嚴守繩墨的典型軍人，而不是一位肆應裕如的政治家。他調處複雜的國共糾紛，而對多變的中共無所認識，其不能完成使命，並非意外。雪老對於魏德邁一度建議：劃東北爲中立區，交美、俄托管一節，深不謂然。雪老說，托管往往是對戰敗國某一有爭執之地行之，豈可行之於中國？對於魏氏在我中央某次集會上對我作無顧忌的批評，亦認爲失態。

我記得某次國際性會議，雪老與美國務卿貝因斯（我報紙稱貝爾納斯）都出席。貝氏於雪老發言後，歎爲世界外交上第一流人才，而中國內政往往不能配合，未免可惜。

雪老對我的提攜

前面提到，我於民三九年底來台，四十年初謁見雪老，其時他任總統府祕書長。事先我撰了一篇約三萬字的「大陸匪情觀察報告書」，分呈總統及行政院長陳辭修先生。辭公印交關係方面參考，並約我長談，而以該印本二冊見惠。雪老約見我，謂我的報告書已簽請總統詳閱，他於垂詢大陸觀感後，慰勉有加。他還問我是安徽那一縣，我說是湖北禮山，他客氣地陪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弄錯了！」

過了幾天，總統召見我，對我有所垂詢勉勵，並囑我對共匪問題多加研究，後又派我到革命

實踐研究院作演講。由於我呈 總統的「報告書」對於中共的優點和缺點都直言無隱，所以在去向研究院作報告前，雪公還來一信暗示我，出言宜慎。我的演講反應如何？我不知道，事後有人告訴我，說我是第一個在研究院替共產黨說好話的人。那時談共黨問題的人，總喜歡講他們的「一杯水主義」，學員中有人問中共所至之處，要民間交換配偶之事。我答復說：在大陸上此等傳統也很普遍，但未能證實。我補充說：一般說來，他們對於男女關係是採干涉主義而非放任主義。這樣的答復，也算是替共黨說好話罷。爾後我奉派任革命實踐研究院講座。

我自知既蠢且癩，不适宜政治生活，仍想教書，作點研究著作工作。適逢政大復校，因雪老的推薦，我獲得一教席，恢復我在上海時的粉筆生涯。我在校內不超鐘點，不兼職，在校外不兼

課，認真的教中國近代史，並編印了一本書。但我設法與中共問題研究的方面，保持相當的接觸。民四八，中央研究院設置研究補助費，協助學人從事研究工作，我提出撰寫「中國共產黨史」六年計劃，院長胡適之先生有難色，表面理由是許多資料尚未公開，條件不備，而雪老則一力支持。至民五一，雪老繼任院長，我的計劃進行更為順利，至民五四，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。此書正式自費出版，接受政大校長劉季洪先生意見，名曰「中國共產黨史稿」。我當即以精裝一部送到雪老府上，他笑容滿面，慰勉有加。此書起於民九俄人對中共之栽植，終於民三八大陸之淪陷，三巨冊，二百餘萬言，為世界上第一部，直至今日仍為最大的一部中國共產黨史。一經問世，中外學術機關及學人爭相採購。詎為潛伏份子所構陷，遂於五五年五月中止發行。聞者惜之

，雪公尤為垂念。不過三年之後，有香港第一次盜印。九年之後，又有香港第二次盜印，勢不可遏，而我也很想乘此補救當中疏失，重加增訂，助成其事。他處尚有少量翻印，以供參考，至今海內外已知者有四個版本，為數殆不下二千部，兩者在國內國外各約半數。當然，我個人權益之損失，不可言狀。轉念我於民三九自上海開關出走，再經兩週，大陸即發動全面鎮反運動，到深圳處，賴黃牛「負責運輸」，抵達九龍，「戴得頭顯出漢關」，我的餘生是賺來的，區區「權益」何足掛齒！只要有憑有據的歷史著作能流行於世，則中共的巧言佞色。例如他們正忙着出版的「中華民族史」。終將不能亂讀者耳目。繩以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」、「愛道不愛貧」之義，我是心安理得的。這些瑣細情節，我並未告訴雪老，雪老今日知此，當亦欣然。

鐵血精忠傳

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
定價台幣玖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、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記述戴笠將軍的故事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要目有：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綦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良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良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圍戰、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共二百多篇，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、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感人至深，歡迎購閱。